



社会认同的历程：内地在港大学生生存状态个案研究

肖文明

摘要：对于内地在港大学生而言，作为内地人的社会认同虽然重要，但并不总是显著的，且社会比较是多元化的；其认同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但并非如后现代主义所说已是破碎的认同，而呈现为“流动的融合”的模式。本研究在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与后现代的社会认同观之外，提供了一种更均衡的认同观。同时，对于内地与香港两地群体的融合也具有经验启示意义。

关键词：社会认同；多元群体资格；社会比较

自1998年香港高校开始正式在内地招收大学本科生以来，内地赴港学习的大学生便持续快速增长，从最初少于150人到如今每年至少1800人左右。这一进程的大背景是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与内地不断融合的趋势。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地之间的差异仍然是不可否认的，譬如两地的教育系统就存在不少差异。在这一背景下，内地在港大学生这一群体将切身地遭遇和感受这种两地差异所带来的冲击，他们在此过程中或者感受到一种（真实的或者想象的）疏离，或者努力去与当地融合。他们会不断反思其处境，并在各种社会情境中努力管理与他人的互动模式。这些都引发令人关注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问题。

近年来，对于社会认同的经验研究不断增多，但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内地的流动儿童少年群体、青年群体、农民工及其子女群体和宗教信仰群体（方文，2005；陈映芳，2005；石长慧，2010），而内地在港大学生仍是被相对忽略的一个群体。由于这一群体面对的特殊处境，其社会认同过程也表现出某种独特性和微妙性。本文将通过个案研究来回应以下一些问题：内地在港大学生群体的认同处境是怎样的，他们的认同过程有何特质，还有他们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在回答这些经验问题的同时，本文也将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希望这有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认同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讨论。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方法

认同问题近年来一直都是社会科学界的热点。对于认同研究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视角是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i Tajfel）所提出的社会认同论。社会认同论提出，个体对其自身认同的界定包含社会与个体两个向度（Tajfel & Turner, 1986）。社会认同被定义为种种社会群体资格，这是范畴化过程的产物；个体认同则指的是“依据个人的独特素质而建构的身份”（赵志裕等，2005：202）。社会群体被赋予普遍的范畴特征，这些范畴特征对群体成员具有情感与价值的重要性。当人们具备这些范畴特征的时候，就会被视为某一群体的成员，相应的，该成员会对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做出一个区分。

泰弗尔在对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做出区分之后,便指出人们的日常互动实际是落入以人际互动与群际互动为两级的连续统中。具体来说,人们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有时是以个体本身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在家庭中便是如此;有时则是以不同群体的成员面目出现的,比如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当在特定情境中社会认同变得更为突出时,人们将更可能遵循群际互动的模式;反之,当个体认同被激发时,人们将遵循人际互动的模式。在群际互动中,我们将不断进行社会比较,该过程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内群偏见,也就是赋予自己所属群体的群体特质以正面评价或者强调那些正面的群体特质,与之相对则是对外群予以负面评价或者强调外群的负面特质(方文,2005;赵志裕等,2005;方文,2008a)。当然,社会学家或许会质疑社会认同与个体认同这一二元两分,因为个体始终也是社会性的,但我们要记住这更多的是一种分析性的区分,而且这一区分确实有利于我们更好理解认同的复杂性。

对社会认同论的一个重要批评在于,它倾向于将认同视为一种自然生发的现象,而忽视了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此外,社会认同视角也低估了认同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动这一面(Howard, 2000)。与之不同,符号互动论一方面会强调认同的结构,尤其是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则强调认同的建构与协商的过程,语言在此过程中则扮演关键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符号互动论与社会建构论一样,都“拒绝接受任何赋予群体成员某些本质特征的范畴概念”,提出“所有群体性的事物都是一种社会建构物,一种根据主导性的文化脚本和权力中心所塑造、重构和动员的事物”(Cerulo, 1997: 387)。

然而,社会建构论也同样被后现代主义所批判,后者倾向于对认同进行解构。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建构论事实上与社会认同视角一样,都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相应地,他们强调认同范畴内部的变异性与认同范畴之间的变异性同样重要。后现代主义的目标是要揭示这些范畴在历史流变中不断被建构和流变,其含义也相应不断变化。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研究者倾向于不再将认同视为一体化和单一化的,而将其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和暂时性的事物。根据霍尔(Stuart Hall)的说法,“认同从来就不是一体化的,而且在晚期现代性时期,认同变得愈发碎片化和断裂;认同从来不是单一化的,而是由不同的乃至相互抵触的话语、实践与位置所多重建构而成。认同处于激进的历史化过程中,因此始终处于变化和变迁过程之中”(Hall, 1996: 4)。概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极力主张认同已成为碎片化的、流动的和矛盾性的事物。

本文认为,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仍然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认同议题最具解释力的一种理论,因此这也是本文的主导性理论框架,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符号互动论、社会建构论及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认同的建构性与流变性。在这方面,方文所强调的“多元群体资格”概念是一种有益的推进。方文指出(2008a: 157),“群体资格,因此可以理解为是行动者在社会范畴化或社会分类体制中所获得的群体成员特征或范畴特征。因为社会分类的尺度和标准是多元的,并且在生命历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实际上可具体化为人的多元群体资格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征过程”。对多元群体资格的强调,自然将我们引向对“多元认同”(multiple identities)的强调(方文,2008a: 148)。多元认同之间的冲突、转化和协商,也意味着认同是动态的和具流变性的。由此可见,“多元群体资格论”实际与前述符号互动论、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具有理论亲和性。本文的分析在泰弗尔社会认同论的框架下,也将借鉴“多元群体资格”的概念。同时,受益于符号互动论的启发,本文也特别强调语言与日常互动在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的经验研究将证明社会认同并未像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如此碎片化。

本研究采取的是深度访谈法(in-depth interview)。深度访谈对于认同的研究尤其适合,因为语言与叙事是形塑认同的关键媒介。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是基于笔者及合作者于2007年于香港进行的一系列深度访谈。被访谈对象主要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内地大学生,共六位,分别来自不同年级和专业,同时又分别来自大中小城市与乡村。每位被访谈者的访谈时间都在2小时左右,访谈录音都被转化为文字记录。

二、日常生活与社会认同的形成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内地生(即内地在港的大学本科生)与本地生(即香港本地的大学本科生)各自的生命历程与处境是不同的。差异是认同问题的前提。因此,对认同的探讨需要我们理解差异形成的

复杂过程,这将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认同的具体情境与形成过程。受益于符号互动论和戈夫曼的拟剧论的理论视角(Blumer,1969;戈夫曼,2008),本文的分析将着重从内地生的日常生活视角去呈现,其重点在于内地生在日常互动中所感知与塑造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正是这一差异才促成作为内地生的社会认同的形成。

(一) 不同的旅程

尽管内地生和本地生现在处于同一时空之中,但他们是经由不同的旅途跟着不同的旅伴到达这个终点^①。内地生作为旅伴,他们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化过程的环境,同样的学习程序,同样的高考……总之,他们在其人生旅途中分享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本地生之间也同样如此)。在香港安顿之后,他们继续充当着旅伴的角色,分享同样的语言学习、生活方式适应、未来出路的决策等经历。

对内地生而言,在这一困难的过程中,那些能够提供智识或情感支持的朋友大多都是内地生。在访谈中,当一位被访谈者(XWY)提及“朋友”时,她实际指的就是内地生朋友。

即使对那些与本地生关系很好的内地生来说,“我们”内地生这种观念在某些重要时刻也会被激发出来,如在工作时期,本地学生往往比内地生更有优势,这就会凸显出内地生与本地生的差别:

我觉得他们机会会比我们多很多。就是包括一些大型的 international 的一些 firms 啊,包括香港本地的一些公司也是,他们会比较 prefer 一些永久居民……所以找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唉,香港同学真的是比我们多很多很多的机会。(XJ)

总之,这些共同的经历为他们相互之间的紧密感和亲近感提供了基础。

(二) 机构性的范畴化

现代性之吊诡在于,一方面我们越来越个体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依赖机构(Becker,1992)。各种机构已经深刻地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为了更有效地管控人口,国家机构必须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因此,我们关乎自身的很多范畴概念及相应的社会认同意识,都是由各种类型的机构所塑造的,这也可被称为是制度化标定的群体身份(参见方文,2009)。

当内地生第一次过境时,他们就会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是经由不同的通道进入香港,这一过程实际是按照出入境事务处的要求进行一种范畴化的操作。当他们初次进入香港时,他们的标签是“内地访客”,当他们随后获得身份证之后,他们的标签则转成“香港居民”,而他们的香港同学则是“香港永久居民”。这种出入境的不同通道,其实就是将来往香港的群体分成了至少三种以上的社会群体,而每一次的出入境行动便是在更新和强化各自群体的身份感。

进校之后,香港各大高校都会在入学前由学生会组织迎新营(orientation camp)活动,这种活动的功能实际就是一种能够创造群体团结的仪式(Turner,1977)。然而,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在2004年之前并无面向内地生的迎新营。内地本科生联合会自2004年开始组织专门针对内地生的迎新营,但内地生的迎新营的活动与本地生的活动大不相同。由此,内地生和本地生实际是通过不同的仪式来成为同一“部落”的成员。此外,内地本科生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它专门负责与内地生相关的各项事务,且不隶属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这一机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内地生和本地生之间的差别。正如一位被访者(XJ)所说,内地本科生联合会的目标就是要为内地生在香港提供一个家,而且她非常自豪地指出这个组织是非常团结的。然而,这种团结会进一步强化内地生对所属群体的依赖性,相应地无形中则会带来与本地生的疏离感。事实上,有本地生反映,晚近几届的内地生的广东话水平不如往届内地生,这是由于内地生群体的扩大及对内地生群体的依赖性增强,使得这几年的内地生学习广东话的动机下降所致。

(三) 符号边界

无论是符号互动论还是社会认同论,都非常看重语言在社会认同中的作用。事实上,语言往往被内地生提到是影响与本地生互动的最大障碍。显然,多数被访谈者感觉由于语言问题而使得香港显得很不一样。当他们能够使用广东话进行日常沟通时,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因为他们并不是很熟悉广东话的

^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安德森,2005),就使用了旅伴这一概念来解释南美的民族主义的兴起。

俚语，相应地就无法把握语言当中的微妙含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而使用普通话与内地生的交流则让他们更放松。一位被访谈者提到：

我觉得跟大陆同学玩是玩得比较尽兴，比较开心的。然后，跟香港的同学一起玩，就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其实他们……他们……给我感觉，他们很会玩，就是一帮子人在一起，他们会想很多的游戏啊，很多……嗯……就不同的玩法。然后，会让你觉得很开心。但是，开心是开心，但不一定很尽兴，因为你就觉得你是一份子，你是参与的一份子。但是你在大陆学生那一边，你是 take 一个比较 active 的那种 role。可能有时候你说一些笑话，大家会 follow 你，会很开心。但在那边（香港同学那边）你就是笑的人，会很少说你 leading，然后在那儿说一个甚么笑话，然后笑。因为可能语言是一个挺大的障碍。（XJ）

概而言之，语言构成了内地生和本地生之间的一道无形的符号边界（Lamont & Fournier, 1992），这种符号边界是两个群体都能共识性地感受到的。此外，香港所保留的一些传统风俗也同样构成一种符号边界。内地学生遭遇这种风俗时会有文化冲击之感，比如某些传统的忌讳，在内地生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但某些本地人仍然十分看重。

这样的经历令内地生强化了两地社会存在差异的印象。这种符号边界虽是隐而不彰的，但又是根植于过去的生命历程和文化经历，往往并不容易跨越。这一难以跨越的符号边界，也就进而不断塑造和生产着群体边界。

（四）集体记忆的叙事

在同一时空下的个体生命历程的重合就构成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透过各种媒体的叙事，就变得更加为坚固。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及相应的传统社区的衰败，以及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香港社会产生了很多有意识的对香港社会的分析和香港集体记忆的叙事（吕大乐，1997；吕大乐，2007）。

内地生很难深入理解这些香港故事所包含的情感与价值，而香港学生也同样很难理解诸如内地的“七零后”和“八零后”之间的区别。集体记忆强化了内群体的团结感，但与此同时也界定了谁属于外群体。下面这段话就颇能说明这一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上《香港社会》嘛，然后就说到一些教育制度之类的，那，其实我跟他们是没有集体回忆的（笑），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说起自己中学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些很有趣很有趣的东西，我完全没有任何体会。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 outsider 了，就是很难体会他们的那种感觉。（XJ）

集体记忆的叙事无疑是界定群体身份的重要来源，人们在这种叙事中共享一种意义和价值，感受到相同的生命历程与集体命运。因此，集体记忆的叙事的不同就直接带来了群体的区分，正如 XJ 所说的，会让人感到自己属于“局外人”。每一次集体记忆的叙事言说在解答“我们是谁”这样的现代社会经久不息的困扰的同时，也强化了内群/外群的区分。此外，对于大四的学生来说，他们在香港已经停留近四年，这一时间长度原本足以让他们创造出一种可以与本地生共享的集体记忆的叙事。然而，在我们的访谈当中，似乎没有一位学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叙事。这种集体记忆叙事的差异与缺失，无疑会持久地塑造这种彼此间感知的群体差异感。

三、社会认同激活的内群差异及其影响

社会认同与个体认同是一种复杂的合体，往往缠绕在一起，究竟哪一部分会被启动激活，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情境（方文，2008b），也取决于不同个体的社会背景。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内地生都对作为内地生的社会认同都很敏感，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更少关注这一议题。在此过程中，某种排斥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会刺激认同的形成。那些对社会认同议题较为敏感的个体，换言之，作为内地生的社会认同更容易被启动激活的个体，往往会将内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互动理解为一种群际互动，而相互之间的障碍或者冲突也往往被归因为不同群体的特质差异。

此外,社会认同更容易被启动激活的个体,也倾向于对内群和外群进行价值界定,强化内群的群体特异性,并赋予内群以较好的价值评价,而对外群予以负面评价(参考方文,2008a)。

与之不同,对另外一些内地生而言,作为内地生的社会认同不太容易被激活。他们倾向于将内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互动理解为是人际互动,并且强调不同群体内部是不同质的。当访谈者提出一些问题是关系到群际关系或者群际差异,他们倾向于淡化这种差异,或者是将这种群际互动模式转化为人际互动模式:

但是后来,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就觉得,其实香港同学也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在乎大陆和香港这么一个区别喽。他们可能还是比较看你这个人,就说……后来我也了解到,其实有香港同学也不是很喜欢某些香港同学的(笑)……(XJ)

相应的,那些对社会认同比较不敏感的人,往往将社会互动中的障碍归因为个体的人格。

此外,这部分内地生对于本地生的帮助印象更深,并且倾向于给予正面的评价:

问:那你就觉得就是说在你和香港同学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还是?

答:嗯,我觉得如果是大学生的话,我所接触到的人对我们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可以说都,有时候会显得过分友好。……然后她(注:被访者的香港室友)说,这是她的一份义务,让她的同房,也就是我啦,多多了解香港啦(面露感激之色),多多带她(我)出去玩呢,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香港的同学对我们还都是很友善啦,就是愿意告诉我们一些东西,然后也愿意听我们说一些东西。(XJ)

由于这部分内地生对于社会认同不是很敏感,他们也倾向于弱化群体特异性。例如,当访谈者问XJ关于内地生和本地生的差异时,她甚至不知如何回答。

概言之,社会认同更容易被激活的个体,倾向于将社会行为理解为是群际互动,将社会互动的障碍归因为群体特质的差异,并强化内群的群体特异性,赋予内群正面的价值评价,而对外群进行负面的价值评价;与之不同,社会认同较难激活的个体,倾向于将社会行为理解为是人际互动,将社会互动的障碍归因为个体特质的差异,并弱化内群的群体特异性,对外群赋予正面或者中立的价值评价。从社会认同论的视角来看,前者实际使用的是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的策略(参见方文,2008a:87),这有利于减少对外群的刻板印象。在本个案研究中,QK属于前者,而XJ代表后者。我们注意到,QK不同于XJ的一个地方在于,他是来自于内地的农村,家境相对不宽裕。这提醒我们,社会认同的激活与社会分层之间可能有某种关联,而其中的社会心理机制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背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不利于行动者采取去范畴化的策略,进而强化了对外群的刻板印象。另外,社会认同的激活如何影响到个体对社会行为的认知、对社会互动障碍的归因及社会比较,这些都值得做进一步的系统研究与探讨。

四、多元群体资格与社会比较

正如方文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认同实际是由多元群体资格所构成,甚至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是多元社会认同。在日常互动当中,并非所有群体资格或者说社会认同都会被激活,而是特定的社会范畴及相应的社会认同成为显著的(方文,2008b)。以本文关注的内地在港大学生而言,他们既是内地人,但他们又同时是大城市人、小城市人或者农村人,同时,他们是生活在香港的内地人而不是生活在内地的内地人。这种多元的群体资格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会相应带来多元的社会比较。

被访谈的一些内地生,往往会忽略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社会比较,而是转向对内地不同区域之间的社会比较。我们从下面这段话中可看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社会比较变得更重要:

问:你说的是哪些人?(注:指的是被访谈者不喜欢的一些人)

答:我觉得跟家庭教育有特别大的关系,我觉得……基本上是从小地方来的。(轻描淡写的语气)(XWY)

XWY是来自内地的一个大城市,上述对话显示,在她的多元群体资格中,作为大城市人的群体资格被激活成为显著的。群体资格的激活是根据可接近性、可用性和显著性三个原则(方文,2008a:162),大

城市人的群体资格对 XWY 而言恰恰是符合这三个原则。当 XWY 激活作为大城市人的群体资格时，她实际将自己与本地生放入同一群体资格中，在这个意义上，她和本地生是相同的，但同时却把另一部分内地生排除在外。在这个过程中，她用大城市人/小地方人替代了内地生/本地生的社会比较，同时也在强化另一种内群偏见。

此外，有时内地生似乎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他们不是香港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与此时生活在内地的内地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内地生处于一种独特的处境之中。这一独特的处境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并带来一种独特的社会比较模式。有时，他们会处于内地与香港的比较之中，有时则是身在香港的内地人与身在内地的内地人之间的比较。而且，正如 Juliet 所指出的，“回到内地之后，反而以这些曾经看不惯的东西（注：指香港的穿着打扮习惯）为荣”，在后一种社会比较中，他们实际会获得某种优越感。

另外，人们并不总是将整个内地与香港进行比较。有时，我们会将香港与内地的某一区域（如深圳）而非整个内地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内地生可以进行评价，而不必考虑他作为内地人的社会认同。换言之，作为内地人的社会认同是在将香港与整个内地进行比较的这种特定情境中被建构出来的。然而，这种比较不时也会被放弃或者削弱。

概言之，尽管作为内地生（相对于本地生）的社会认同对内地生而言始终是重要的，但由于内地生的多元群体资格，作为内地生的社会认同并不总是显著的。在日常互动中，不同的内地生会凸显不同的群体资格，进而进行不同的社会比较。

五、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流动的融合

事实上，无论这些访谈者社会认同状况如何，他们身上都已经烙上香港文化的印迹。比如，当他们用普通话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加上一些广东话来表达，或者经常穿插几个英文单词。他们的穿着打扮也比较接近香港风格。有一位被访谈者（Juliet）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她所在的一个课程项目小组中有另外一位内地生，但她们各自以为对方是本地生，直到有天一起去见一位老师才知道真相。此外，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很大程度上受到香港的影响。

尽管被访谈者身上都体现出一些与本地趋同的特征，但他们当中多数都选择将来回到内地，尽管在毕业后数年内他们会留在香港。相应地，他们就不会努力去完全融入本地社会。正如被访谈者所言，香港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座桥梁或者是驿站。“桥梁”或者“驿站”这样的比喻意味着，香港对他们的生命历程会产生影响，而且他们也不会抗拒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主宰他们的内心，而且他们人生的目的地也会是在别处。下面这段话就很能说明这种心态：

就是我要跟香港建立某种感情，就是我会在香港买房子的，我已经在计划这个了，我会在香港工作，我会在身上带有香港的气息的。但是我最终的目的地不在香港。我最终还是会回到内地去的。但是回到内地之前一定要走一圈。我一定会去美国的，绝对。我这个夏天还要去伯克利，交换。（Juliet）

杨凤岗曾经区分出三种社会融合的方式：叠合认同（不同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何认同的独有特征）、碎片融合（一种认同占主宰，而其他认同从属于该认同）和融化融合（不同特征的融化，结果是四不像）（参见方文，2008c）。从前述的分析来看，内地生更接近的是碎片融合，但又不完全相同。这是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期待着将来离开香港去西方世界或者最终返回中国内地，香港的历程留下的只是香港的气息，是可变更的暂时认同。他们带着香港的气息，这使得他们有别于“纯粹”的内地人，但他们又不是香港人。带着香港的气息，意味着他们会认同一部分香港价值，但又意识到香港价值与他们自身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仍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称之为“流动的融合”（fluid integration）。流动的融合意味着，他们存在某种主宰性的认同（虽然其稳固性因人而异），而其他认同是该主宰性认同的补充乃至形成一种对立，且其他认同是多元的、流变的，甚至是暂时性的可替换的。

流动的融合实际对应着多元群体资格和多元社会认同的说法，这个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内地

生的社会认同处境,而它与流动的现代性是有莫大的关联(鲍曼,2002)。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中,我们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因此群体资格与认同变得愈来愈多元和不稳定,甚至威胁到主宰性的社会认同,以至于“乡关何处”成为一种普遍的困扰,这或许也是后现代的认同观兴起的一个背景。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内地生的社会认同具有多元性和流变性,但他们仍有某种较稳固的认同存在,如DS所说“读完中学以后我觉得自己的文化本根就已经非常固定了”。此外,被访谈者不少人提到他们在香港学习过程中对传统的重新发现,并有意识地去学习传统文化:

很奇怪,我生活在内地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是漠视的,来到香港,感情特别深,突然发现自己,然后兴趣特别浓厚,比如说我现在每天都在听京剧,听传统相声,之前没有这种习惯。我从来都不听流行歌曲。(DS)

可以看到,香港在这方面扮演着推动作用,因为它仍然保留了不少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它所受到的西方影响也成为内地社会的一面镜子,这就使得内地生能够重新体认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这说明,流动的现代性当中的个体化和不确定趋势虽然是真实的,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传统社会认同(如中华民族认同)的消亡。作为个体,人们仍然需要且珍视某种共同的社会认同,来赋予他一种确定感、意义感和自在感(参见赵志裕等,2005)。事实上,晚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和非世俗化的趋势(参见伯格等,2005),就可理解为是人们在流动现代性中对一种稳固的社会认同的追寻。

六、讨论与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内地生与本地生的社会化过程、集体记忆等方面的差异,在日常互动中会建构出内地生(相对于本地生)的社会认同。但这种社会认同在日常互动中并非总是显著的,而因个体而异,这方面与社会分层具有相关性,并影响到个体对社会行为的认知、对社会互动障碍的归因及外群偏见。此外,由于内地生具有多元群体资格,他们往往会以大城市/小地方人等社会比较取代内地生/本地生的社会比较。最后,内地生的社会认同体现出“流动的融合”的模式,其认同具有多元性和流动性,但又有相对稳固的主宰性社会认同,因此后现代主义所声称的破碎的认同是不准确的。

本研究认为,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所提出的社会认同/个体认同、群际互动/人际互动等二元两分和概念,仍然是富有启发的。但我们对这些概念范畴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必须要更为小心。本研究说明这些范畴的运作过程是动态的、多元的和可变的,而社会比较则是多向度的,这些方面都是社会认同论有所低估的,在这方面,符号互动论和社会建构论所强调的社会认同的建构性和流动性是有益的理论矫正,而“多元群体资格”是一有益的概念并有相当的经验解释力。但本研究也不会走向另一极端,以后现代的口吻声称统一的认同已死,认同已成为彻底碎片化的。对当代社会认同研究而言,应在相对静态的泰弗尔社会认同论与极端的后现代认同观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以回应流动的现代性下的认同处境。本文所构建的“流动的融合”的概念或许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此外,本研究对内地与香港两地群体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经验启示意义。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历史因素所导致的差异,两地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相应的社会认同问题仍是客观存在和需要正视的,但这种社会认同并不必然会影响群际关系。我们有很多社会心理机制去处理化解相关问题,如去范畴化机制。换言之,我们要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社会交往尽量将其从群际互动转化为人际互动,也就是说,人们应以具体的个体而非所属群体的成员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交往之中。正如前文所言,差异是认同问题的前提,因此这种去范畴化机制的实施需要双方在具体实践中实现“淡化差异,强化认同”或者说“异中求同”。例如,内地本科生联合会这种组织需有意识地强化与本地生的共同交流与活动,需强化一种共同体意识而非小群体意识。内地人需强化对香港历史文化之了解,与此同时,香港人也需要强化对内地以及整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了解。这一方面需要两地政府有意识地促进这种交流并将这种交流制度化和常态化,也涉及到对两地教育内容的充实调整(如香港的国民教育问题)以及语言学习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两地应共同致力于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认同,而这需要集体记忆叙事的构建和社会共识的达成(参见赵志裕等,2005;方文,2008a:85-88)。这种集体记忆叙事应是有感染性和说服力的,更重要的是,

它是关乎两地且为两地所共享的。另外,我们不能低估社会行动者面对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能动性,本文所揭示的多元社会比较,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要注意社会分层机制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社会交往当中的中下阶层的社会认同与相关的利益处境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着重分析的是社会认同当中的社会心理机制,而这归根结底需要仰赖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支撑与配合,但后者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

参考文献:

-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 鲍曼(2002). 流动的现代性.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3] 彼得·伯格等(2005). 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4] 陈映芳(2005).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社会学研究, 3.
- [5] 方文(2005). 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 社会学研究, 1.
- [6] 方文(2008a). 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7] 方文(2008b). 群体资格: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 1.
- [8] 方文(2008c). 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 社会学研究, 6.
- [9] 方文(2009). 政治体中的信徒——公民困境:群体资格路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6卷, 4.
- [10] 戈夫曼(2008).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 吕大乐(1997). 唔该,埋单! 香港:闲人行有限公司.
- [12] 吕大乐(2007). 香港四代人. 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
- [13] 石长慧(2010). 我是谁?:流动少年的多元身份认同. 青年研究, 1.
- [14] 赵志裕、温静和谭俭邦(2005).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 社会学研究, 5.
- [15] Becker, Ulrich(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6] Blumer, Herbert(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7] Cerulo, Karen. A (1997).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 [18] Hall, Stuart(1996).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 P. d. Gay (ed.),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9] Lamont, Michele & Marcel Fournier (ed) (1992). *Cultivating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 Tajfel, Henri & John. C. Turner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Worchel, S. & William. G. Austine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2nd ed.). Nelson-Hall Publications.
- [21] Turner, Victor(1977). *The Ritual Proc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Mainl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Hong Kong

Xiao Wenm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the social identity as mainlander is important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Hong Kong, it is not always salient in everyday interactions, and the patterns of social comparison are also pluralistic. In addition, their social identities are fluid and variable, but not as fragmented as claimed by the postmodern identity theory. This finding provides a more skalanced alternative to Tajfel'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postmodern identity theory. Meanwhile, it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Key words: social identity; multiple memberships; social comparison

■作者地址: 肖文明, 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Email: wenmingxiao@gmail.com。

■基金项目: 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1M501354);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209163)

■责任编辑: 桂莉